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设与边疆治理

●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委 李大龙

202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回望中国边疆研究，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从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视角审视，与新时代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也面临着国外学界和分裂势力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解构带来的挑战。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共同缔造的，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密切着相互之间的关系，最终在近代以“中华民族”的名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如何在“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指导下建设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还需要创新思维，超越一系列的传统观念才能实现。

坚持“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指导，需要超越历代王朝传统史观

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必须首先给出明确答案的基础问题。“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高度理论概括，为我们认识和诠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形成的历代王朝史观，依托于以《史记》为开端的“二十四（五）史”，已经形成了以历代王朝兴替为主要内容的“正统”史观，搭建起了以历代王朝历史沿革为框架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近代随着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最终形成了以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叙述范围“上溯”、历代王朝政区沿革、政权更替为主要线索的话语体系。将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众多政权和人群划分为“中央王朝”和“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华”与“夷”是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凸显历代王朝和“华夏”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

毋庸讳言，历代王朝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应该是给予高度充分肯定的，但以历代王朝历史为框架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面对西方学界不断出现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长城以北非中国”“内亚史观”“赞米亚史观”以及“新清史”等观念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尤其是中国边疆历史的解构，传统话语体系是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击效果的。

历代王朝史观最为明显的不足在于，历代王朝只是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众多政权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和被称为“夷”的人群不仅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难以忽略的重要作用。“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提出，为我们客观准确认识中华大地上两类政权和人群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不仅是对传统历代王朝史观的超越，也是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史观的超越，可以更加准确地指导我们认识和诠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构建起更加完善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设需要超越以往的“中国”研究视域，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历代王朝史观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历代王朝被称为“中国”，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和历代王朝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是学者认定其是否属于“中国”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其实践能够成为中国边疆研究重要内容的原因之一。但是，以“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审视历代王朝和地方（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地方（边疆民族）政权是否属于历代王朝的“中国”并不是唯一的要件。

回顾已有的边疆治理研究，多数论著的聚焦点是集中在历代王朝身上的，将历代王朝称为“中央王朝”或者视为“汉族王朝”是其突出做法，而对于辽阔边疆地区的历史则习惯于从历代王朝的治理视角下进行解释是普遍做法。实际上，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既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历史

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提供了基础。以汉代中国为例，汉朝并不是中华大地上唯一的政权，同时期还有匈奴、鲜卑、乌桓、卫氏朝鲜、南越、西南夷以及“西域三十六国”等众多政权和时期。匈奴是草原地区出现的政权，自春秋战国时期即被中原政权视为“边患”，但在西汉文帝时期匈奴不仅实现了对蒙古草原地区众多游牧人群的统一，而且将鲜卑、乌桓和西域纳入其有效管辖之下，尤其是设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对西域的治理虽然使之成了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主要障碍，但却为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有关西域都护府的记述中将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府两个机构视为前后相继关系的直接原因。因此，新时代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超越以往以历代王朝为主题的研究范式，将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也纳入其中，不仅要客观认识和诠释历代王朝和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治理的历史，而且要对历代王朝和地方（边疆民族）政权在缔造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凝聚中华大地上人群中的重要作用给出客观评价，助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当今的边疆是一个国家疆域的外缘地区，这一属性既决定了边疆是主权国家保卫领土安全的前沿，同时也是国家对外开放、沟通国与国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开拓疆域、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结成了血脉相通、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其凝聚过程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化，即是客观认识和诠释这一过程，而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不仅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疆地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完善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更是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设需要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客观认识和诠释中华大地上人群凝聚的历史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就有了独具特色的按照“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和语言来划分人群的方式，这就是《礼记·王制》所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五方之民”的划分标准和近代传入的“民族国家”观念截然不同，因此在古籍中经常用“人”来称呼不同人群，而不是“族”。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人群称呼，并不是单纯的概念使用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和“族”是两种不同认识，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话语体系，将“人”改为“族”不仅容易对史书的记载出现误读，在西方“民族”语境下也难以理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种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徙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几十万的匈奴人随着政治认同的改变而成为“鲜卑人”，只有在中国传统话语下才能得到正确的诠释，在西方的“民族国家”语境下是难以理解的，只会给出“同化”乃至“种族灭绝”的错误结论。

秦汉以后出现的“华夷之辨”之“华”与“夷”是为争夺“正统”而出现的的人群划分，并没有准确的具体指向，南朝各政权视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为“戎狄之乡”，北魏称南朝各政权为“岛夷”即是突出表现。从“天下国家”的视角审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历代王朝的兴替主导着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主体人群的凝聚，所谓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晋人、隋人、唐人、宋人、辽人、金人、元人等即是；二是历代王朝之外的众多政权主导着局部地区的人群凝聚，所谓匈奴人、乌桓人、鲜卑人、越人、突厥人、高句丽人、渤海人、吐蕃人、南诏人等即是；三是为争夺“正统”而出现的“华夷之辨”，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和政权区分为“华”与“夷”、“中国”与“四夷”，但同时强调“华夷一家”“天下一体”，推动着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实现着超越王朝和政权的凝聚。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只有回归传统认识才能理解其凝聚的过程。近代梁启超将中华大地上人群凝聚的结果——清朝完成“自在”的“中国人”命名为“中华民族”。

从中华大地上人群划分的传统看，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在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过程中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共同体，并不存在“建构”的问题。客观完善诠释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需要观念的改变，不仅要分清两种不同话语体系差异，更要在“五方之民”“华夷一体”等传统观念视角下认识和诠释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完善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改变静态的当今国土范围，从“天下国家”的“有疆无界”向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转变的动态视角才能构建完善的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在中华大地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天下”“中国”乃至“天下国家”等都是动态的，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是经典的表述。放眼世界，划分主权国家领土范围的标志是由一个个界碑构成的国界线。通过谈判、树立界碑来划分领土的做法最初的源头是1648年出现在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被学界视为当今国际法的源头。也就是说，在1648年之前，世界上不存在主权国家的边界，国家之间的界线多数情况下是随着势力的大小而盈缩不定，处于“有疆无界”的状态，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出现，才有了相对稳定的“条约边界”带来的“有疆有界”状态。

反观中华大地，历史上也存在着很多人群和政权，相互之间也存在“边界”，诸如西汉与匈奴以长城为界，唐朝和吐蕃也多次盟誓“定界”，但却以“兄弟”和“舅甥”相称共同构成“大一统”的“天下”。“天下”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当今“条约边界”的“有疆无界”状态的。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具有了表示清朝统治者直接管辖范围的含义，“天下”和“西洋”出现了重合，清朝的“臣民”（国民）相对于西洋人也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中国人”。也就是说，《尼布楚条约》的出现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节点，既是多民族国家疆域从传统的“天下国家”的“有疆无界”迈入主权国家“有疆有界”状态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实现“自在”的象征，更是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同样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标准。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建设需要超越以往传统研究模式，真正实现多学科交融

学界对“边疆”“中国边疆”的内涵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先后出现了陆疆、海疆、空疆、底土边疆、战略边疆、利益边疆等不同认识。传统的中国边疆研究发源于历史研究，且与历史地理研究存在密切关系，其研究对象基本是构成中国边疆的陆疆和海疆，研究者也基本是以历史学和民族学学者为主体，这是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现状的普遍认识。

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史地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等不同称呼的出现虽然体现着不同学科学者认识上的差异，但中国边疆研究包括基础（历史）研究和应用（现实）研究则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而构建完善的边疆治理话语体系应该依托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尤其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设。笔者曾经将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容概括为中国边疆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阐述、以“历代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天下秩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思想与实践、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八个方面，相关话语体系的建设都非一个学科学者的努力所能完成，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这是由中国边疆这一研究对象的内涵所决定的。

近年来，除历史学、民族学外，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军事学、安全学、法学、边防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积极参与中国边疆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大有成为冷门绝学中的热门研究领域的趋势。不过，随着不同学科学者介入中国边疆研究，不同学科学者多从自己学科的角度试图将中国边疆研究设计为其学科的二级学科，这也是上述不同称呼出现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多学科学者的积极参与似乎并没有让中国边疆研究向多学科交叉或交融的方向发展，反而呈现一种被解构的发展趋势，因此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似乎需要对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或交融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多学科交叉或交融视域下的中国边疆研究，不是将中国边疆分解并纳入众多不同的相关学科分别进行研究，而是利用不同学科的理论、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边疆这一个具体对象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结论呈现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特点。

总之，加快构建边疆治理话语体系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中国边疆研究提出的时代要求。中国边疆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超越以往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新观念，在多学科交叉或交融的视野下，深化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指导下构建起完善的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助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本专栏由兵团日报社、新疆日报社（新疆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办】

巍巍天山见证沧桑巨变，壮美新疆谱写盛世华章。当历史的年轮驶过七十载光辉岁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迎来了成立七十周年的荣耀时刻。这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恢宏史诗，是一曲新时代的党的治疆方略引领下阔步前行的壮丽凯歌。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边疆实际相结合，在祖国西北边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形成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标注了新的历史方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新疆视察，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汪凌燕 张付新

从历史维度看，七十载山河巨变彰显制度伟力。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开启了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恢宏篇章。七十年来，从“一白（棉花）一黑（石油）”的资源禀赋到“十大产业集群”的动能澎湃，从“出行靠驴马”到“高铁通河谷”，从“风沙掩绿洲”到“大漠披绿装”，天山南北写下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最生动的注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新疆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形成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新疆事业取得大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只有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才能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

从理论维度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部署了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点工作，以“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疆”的问题，以“八个坚持”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疆”的问题，其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为各族群众构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把“高质量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把“兵地一盘棋”作为发展的重要抓手，赋予兵团新的时代使命。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一经落地，即转化为方法论、施工图，新疆大地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从实践维度看，兵地同频共振奏响融合最强音。兵团是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七十多年来，兵团始终牢记党中央赋予的维稳戍边特殊使命，与自治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稳边固边、兴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兵团与自治区同频共振、融合共进。一是规划“同绘”，兵地国土空间“一张图”落地，园区、路网、绿洲带无缝衔接，重大项目同步选址、同步建设；二是产业“同链”，兵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携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共谋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势头愈发强劲；三是交通“同网”，兵地交通运输部门秉持“兵地一盘棋、规划一张图、建设一张网”理念，在交通规划、项目建设、货运枢纽共建等方面深度融合，一批兵地融合重点公路项目在天山南北建成通车；四是民生“同享”，自治区的惠民工程与兵团民生行动叠加，兵地群众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中携手迈向共同富裕。

从未来维度看，在中国式现代化大道上阔步前行。站在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新起点，兵团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全面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高质量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重点实施“五大行动”。一是提升维稳戍边能力，始终坚持稳字当头，严打严防“三股势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努力形成新时代维稳戍边新优势；二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融入新疆的产业集群，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七大主导产业、21条重点产业链，加快建设兵团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全面推进兵地融合发展，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兵地联动协作和沟通协调，推动兵地经济发展一体化规划，深化社会交往交流，完善干部人才交流使用机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嵌入新格局；四是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文化润疆、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着力丰富节日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丰富优质的文化和旅游市场供给，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铸牢中国心、中华魂；五是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公共安全治理，让各族群众在高质量发展中共享高品质生活。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扬帆。七十载砥砺前行，新疆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向未来，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上谱写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壮丽华章！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个维度，感受新疆高质量发展脉动

理论周刊

理论

导读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走向光明与进步

详见6版

坚持不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详见7版

着力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详见8版



本版主编 刁腾飞
责任编辑 李志军
视觉 武帆